

農曆新年前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中國大規模爆發，至今疫情已迅速擴散至全球超過二百個國家和地區，確診感染和死亡人數持續增加，被世衛定性為「全球大流行」。新冠疫情不僅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帶來深遠影響，對人們向來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信念和價值也構成了巨大衝擊。後新冠時代的中國與世界何去何從？敝刊歡迎海內外論者撰文深入評析。

——編者

「示人」與「示己」之間的 《蔣介石日記》

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日記因作者的在場、親歷而愈發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假如作者能夠真誠、準確地記述所見所想，則日記成為可靠的一手史料定當無疑。真實度較高的日記可以帶領研究者逼近真相，按照日記所述廓清「案」發現場、提取確鑿證據，從而給歷史破「案」（如王奇生在《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中利用《王子壯日記》揭示國民黨中常會之弊病）。

但是，歷史研究者無法一廂情願，因為日記作者不一定秉筆直書，作為後來人的研究者遠離親歷者的時空，如何機智地洞悉日記作者的意圖從而有效利用其留下的筆錄，最終澄清史實，成為一個問題。王靖雨的《淺析〈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的學術價值與使用方法》（《二十一世紀》2020年2月號）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一文將這個問題具體化和個案化，啟發研究者該從哪些維度去思考一部真實度較高的日記之學術價值，如何在「示人」與「示己」之間，解讀日記作者的話語、情感表達來提煉史料。

如王文所指，受陽明心學等儒家思想影響至深的蔣介石，其日記寫作是一種「修身手段」，帶有很強的私密化色彩，由此保證了其手稿本日記的「真實度」。這一點也可以解釋為何當前有些中共革命史研究者比較重視劉榮、高魯等人的日記（如黃道炫的論文利用其研究抗戰時期中共幹部的婚戀管控與個人心靈自由之間的微妙關係），原因即在於日記中「示己」的一面提升了可信度，作者那些內心的話語傾訴和情感宣洩，可能有助研究者闡明歷史事實。於是，蔣介石對張學良、胡漢民等政要，對陳布雷、戴笠等幕僚，對宋美齡、蔣母等親人於日記中的稱呼變化、關切或憤怒之情都變成了一種可通過文字表述而洞穿其真實想法的線索。

不過，蔣介石是「一國領袖」，其身份非同一般。此類人物在寫日記的同時不能不考慮後世潛在的讀者，因而無法擺脫一旦日記公開所帶來的功

過評價。因此，其手稿本日記又有了「示人」的一面，對某些重大政治問題，如清黨、湯山事件、力行社、新生活運動等，蔣介石的「沉默」抑或「申辯」可能都帶有一定的「化妝」意味，研究者便需要借助其他史料來對比、互證（如金以林在《國民黨高層派系政治》中即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國史館檔案、《蔣介石日記類抄》、《事略稿本》，結合黃郛、邵元沖、周佛海等人的日記及其他史料與手稿本互證），彌補因蔣介石的假裝「不知情」而帶來的日記真空。

總之，日記文本的價值和作者身份、寫作目的、時代環境相關，也受其語言習慣（如文言或半文言、白話或半白話的行文方式，句讀和標點符號的考慮等）、性格、心理等因素影響，甚至還會牽扯上後來編者或出版方的意圖（如《事略稿本》、《大事長編》以及其他蔣日記抄本帶有「後編者刻意」，有潤色、粉飾之嫌）。王文在給研究者提供一個思考日記史料價值、有效使用日記方法的同時，也啟發研究者採用多學科、交叉學科之研究路徑去更好地認知作者形象，努力還原「真實的人」。如此，兩相結合，

日記文本與作者形象互證，對近代史研究來說大有裨益。

耿殿龍 淄博

2020.3.5

知識份子的「獨立性」和「依附性」

近代中國社會處於大轉型時期，知識份子的命運跌宕起伏，他們與實際政治的關係往往是「剪不清，理還亂」，既想維持「獨立性」，同時又擺脫不了「依附性」。鄭會欣的〈蔣介石與民國學人關係的嬗變（1932-1949）〉（《二十一世紀》2020年2月號）一文分析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蔣介石與民國知名學人的關係，即是這一研究的具體案例。蔣介石對民國學人的態度是既愛又憎，一方面想將之納入政府，為蔣氏政權效力；另一方面又時時提防他們。民國學人身上既存在追求民主自由的特性，又擺脫不了「以天下為己任」、「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士大夫之觀念，兩者之間不斷鬥爭糾纏，使得民國學人對蔣介石也是既愛又恨，從順從、合作，到疏遠再到決裂。就方法論而言，作者以當事人（蔣介石、顧頡剛、竺可楨、鄭天挺等人）的日記為基礎，以時間為主軸，既有蔣介石與民國學人關係的總體考察，也有個案分析（如顧頡剛），是一篇較為扎實的實證性研究。不過，讀後也有意猶未盡之感。

一是民國學人自身的角色問題。民國學人被蔣介石納入國民政府中，是由「觀念人」走向「行動人」。他們自身的觀念中固然有着清高與獨立的秉性，但身處現實行動中，又難

以做到「出山要比在山清」。他們既已加入政府，想真正與政府對抗亦為不易，表現出對當權者的「依附性」；而鄭文呈現的似乎只是民國學人的「對抗性」，卻沒有涉及到「對抗性」的源泉——部分是因為當權者的意志，這使得學人的對抗具有「依附性」。因此，文中所宣揚的對抗性究竟有多大效力和自主性還需斟酌。

二是方法論問題。鄭文以研究對象的日記為基礎，詳細爬梳蔣介石與民國學人的關係，但似乎有「為考證而考證」之弊，稍欠更為宏觀的視野。例如同樣是處於轉型時期的晚清、北洋時代，知識份子也有介入現實政治的實例（如「好人政府」等）。那麼與上一代學人和當權者關係相比，蔣介石與民國學人的關係有何異同？知識份子的「獨立性」和「依附性」在此過程中又是如何糾纏？這種糾纏是否就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擺脫不了的宿命？

王琛 合肥

2020.2.29

「澳門模式」的可持續性

余永逸的〈論澳門「一國兩制」模式的可持續性〉（《二十一世紀》2019年12月號）一文，通過梳理澳門自1999年回歸以來其政治體制特點、公共政策的施行、政府官員的背景，以及特區與中央政府的互動關係這四個方面，來分析為何「一國兩制」模式在澳門特區得以成功施行，以及該模式未來在澳門的持續施行將會遇到的阻力。

首先，作者指出澳門政府的親中特性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回歸以前澳葡政

府統治的孱弱和澳門華人本土社團的興盛，而後者中的親中派因其有背靠北京的強大資源，以及澳門本身封閉的政治體制，因而在選舉中佔據壟斷性優勢；其二在於澳門本地保守的「臣屬型」政治文化，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大於意識形態鬥爭，比之香港接連不斷的社會運動，澳門要顯得和平安靜許多。其次，澳門政府實行「分贓」政策以抑制社會運動的產生，通過實行不同名目的減稅政策、保障政策以及給予現金津貼，來分散居民對社會問題的注意力及平復其不滿情緒，從而避免政治動員及社會運動的發生。再次，「一國兩制」模式在澳門的平穩施行和特區政府政治體制的穩定離不開許多澳門政府官員的內地背景，在調和中央政府政策與澳門本土實際問題中起着重要作用。

余文對於「一國兩制」模式在澳門發展的脈絡敘述詳實清晰，同時也佐以大量的文獻及制度條文參考。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文末對於該模式可持續性的分析卻給人以不夠全面深入之感。作者似乎只強調了澳門青年一代政治意識的覺醒，卻未曾詳述箇中原因。為何澳門的「分贓」政策抑制公民政治運動的效果會愈來愈差？是近年賭場收入下降導致的經濟下滑影響到公民生活，抑或有其他原因？如果作者能對近年澳門社會經濟狀況有進一步的描述，並結合「一國兩制」模式的運行加以探討，或許能引發讀者更加深入的思考。

嚴飛 北京

2019.12.28